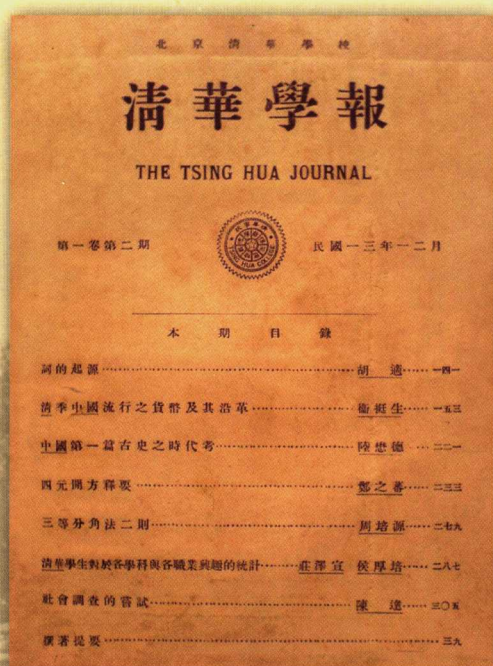


現代中國

第十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中国

第十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第十辑/陈平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301-13436-8

I. 现…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2254 号

书 名: 现代中国·第十辑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436-8/G·22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75 印张 369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现代中国

第十辑

目 录

论 文

- 木下犀潭学系和“中国文学史”的形成…………… 平田昌司(1)
“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
——普实克论中国文学…………… 陈国球(23)
- 五四社交公开运动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 杨联芬(35)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 欧阳哲生(56)
李石曾的文化浪漫主义及其留法经历…………… 叶 隽(70)
- 新闻生产与类小说的文体意义…………… 凌硕为(89)
宇宙意识与故国想象:沈宝基、罗大冈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协商…………… 张松建(109)
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
——“寻根”思潮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贺桂梅(129)

演讲与评论

- 鲁迅的文化研究…………… 黄子平(154)
现代解诗学思想的思考理路与赘语
——《中国现代诗导读 1937—1949》卷后记…………… 孙玉石(170)
大学精神的另一种探寻
——《大学何为》述论…………… 于述胜(181)

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	夏晓虹(190)
林纾示琮儿书·····	林钢、林大文提供 夏晓虹释文(204)

拓展地方的视野

——读《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	李婉薇(221)
--	----------

在考订与议论之间

——评《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	张小丽(226)
---------------------------------------	----------

通向“观念史”的新途径

——读《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张丽华(232)
---------------------	----------

新史视域与文史传统

——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彭春凌(238)
--------------------------------	----------

历史化的双重视域

——读《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 ·····	朱 羽(243)
--------------------------------------	----------

新诗研究空间的再拓展

——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李 佳(248)
-------------------------	----------

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空间的开拓

——读《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李松睿(253)
-----------------------------	----------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孙春芳(258)
-------------------------	----------

文学史家的教育情怀

——《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读后·····	吴 微(263)
-------------------------	----------

华文异彩，踵死而生

——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谢 俊(268)
----------------------	----------

当文学史写作成为“话语事件”

——评李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李建立(273)
--------------------------	----------

编 后·····	(280)
----------	-------

木下犀潭学系和“中国文学史”的形成

平田昌司

一 木下犀潭及其学系

熊本县位于日本九州岛西部,古称肥后国。1633年细川氏被德川幕府封为肥后熊本藩主,一直世袭到1871年。明治维新以后屡经改置,1876年确定了今熊本县的疆域。在19世纪中期,熊本藩“学校党”、“勤皇党”、“实学党”之争相当激烈,内部的舆论不统一,因此在明治维新之际未能占据主导地位。本文讨论熊本藩木下犀潭学系对19世纪后期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犀潭的一些弟子如在19世纪70年代筹划办学的济济黄师生对待晚清中国“开化”的一些态度。

木下犀潭(1805—1867)^①,通称宇太郎(后改为真太郎),名业广,字子勤,号铈村、犀潭、澹翁。木下氏是肥后菊池郡今村人,世务农。犀潭10岁时师从同乡儒医桑满伯顺(1768—1857)学汉唐传疏^②,19岁入熊本藩校时习馆,改治程朱之学^③。天保六年(1835)成为熊本藩主伴读以后常扈驾赴江户,7月8日谒佐藤一斋

① 木下犀潭传记主要根据安井息轩《木下子勤墓碑铭》(竹添光鸿辑《铈村遗稿》卷首,木下广次刊本,1884年)。另参盐谷宕阴《送木下子勤序》(《宕阴存稿》卷三,山城屋政吉刊本〔日本国会图书馆近代电子图书馆 Digital Library from the Meiji Era 影片。下面简称“近代电子图书馆”〕)。

② 《铈村遗稿》卷二《负郭桑满先生墓铭》;武藤1911,第800—801页。

③ 据元田永孚所转述的横井小楠谈话,宝历五年(1755)创建时习馆时,秋山玉山祖述获生徂徕的古文辞学,藪孤山讲程朱之学,高本紫溟的学问小。横井还以为,熊本藩的学者往年不善于文章,近世有人游学江户,渐渐知道学习唐宋八家文(《还历之记》,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书 第一卷 自传 日记》,东京:元田文书研究会,1969年,21页)。

(1772—1859)^①,与安井息轩(1799—1876)、盐谷宕阴(1809—1867)等名儒交往密切。后来历任世子伴读、时习馆训导、公子侍讲等。“学主程朱,但不墨守”,在海防论兴起以后,让门人积极阅读《东华录》、日本村上纬等《清三朝实录采要》、魏源《海国图志》等了解清代历史、西方史地^②,文久三年(1863)曾托人为时习馆订购《瀛寰志略》、《官板巴达维亚新闻》、《舆地航海图》、《英国志》、《万国综览》、《联邦志略》、《地球万国方图》^③,甚至“及洋学兴,门人有读蟹字者,则勉以通观大势,讲究兵略”。日常生活俭朴,为人温和、谦恭、真率,为山田方谷、河井继之助等所敬重^④。根据木野 1981—1982 的分析,《桦村书屋门生名籍》记录的弟子名单里学校、勤皇、实学各党都出现,说明犀潭能兼容并蓄,门户之见不深。但在承认西洋文明的同时,他仍然强调“圣人之治,建极明伦,父道也;厚生利用,母道也。孔子爱礼弃羊,宁去母道不失父道,是为义利之辨;洋夷为国,务惠恤其民,是独得母道,若夫伦理纲常则亡矣,然为举世所歆艳。自今而往,彼此消长,骎骎乎有大义拂世之势,可不惧乎哉”。著有《桦村遗稿》2 卷、未刊《日记》等。

犀潭弟真弘(1824—1897),号梅里,为了“振作人心,以培养国家之元气”,用汉文写过丰臣《丰太阁征外新史》^⑤。弟助之(1825—1899),出继玉名郡伊仓的木下氏,明治维新以后任熊本县县会议长、众议院议员等。助之的养父初太郎的胞弟竹崎律次郎夫人顺子,出自熊本名族矢岛氏(参看附图)^⑥。

① 高濂 1922,第 809 页。

② 井上毅《灯下录》卷二(文久元年[1861]笔记。《井上毅文书 自笔草稿类》缩微胶卷,东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70 年)。关于井上毅在木下犀潭塾所受的教育内容,木野 1995 已经做过详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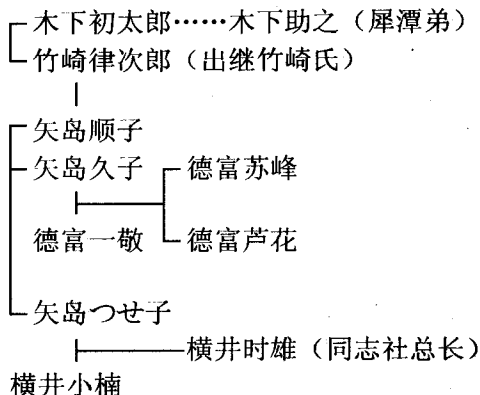
③ 木野 1981—1982 所引木下犀潭日记文久三年 3 月 23 日条(《神道学》第 107 号)。

④ 河井继之助《尘壶》安政六年(1859)10 月 21 日条。竹林贯一编《汉学者传记集成》(东京:关书院,1928 年)把熊本实学党豪杰横井小楠(1809—1869)、明治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18—1891)列入了木下犀潭门人。可是,元田自传《还历之记》称呼犀潭“木下真太郎”,而且还提到横井小楠对犀潭极端“轻侮蔑视”(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书 第一卷 自传 日记》,东京:元田文书研究会,1969 年,第 34 页),竹林所言不可信。

⑤ 武藤 1928,第 379—380 页。

⑥ 德富芦花《竹崎顺子》第一版误把竹崎律次郎当做木下犀潭胞弟。参看《芦花全集》第 15 卷(东京:芦花全集刊行会,1929 年)附册冲野岩三郎“解题”第 14 页。

图 矢岛姊妹



犀潭次子木下广次(1851—1910)留学法国研究法律,回国后担任帝国大学(1897年改称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科大学教授、第一高等中学校(今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校长、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等职务,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创建时任总长。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制度,5月21日访问京都帝国大学跟“总长法学博士木下广次,熊本人”^①相见谈话。

犀潭的主要门人有“四天王”^②:木村弦雄(1838—1897)、古庄嘉门(1840—1915)、竹添光鸿(1842—1917)、井上毅(1844—1895)。木村号邦舟,是明治时代九州著名的国权派团体紫溟会的中心人物之一,还参与了熊本济济黉的创建工作。古庄号火海,是木村弦雄的妹夫,先后任第一高等中学校校长、台湾总督府内务部长、群马县知事、三重县知事等。竹添又名进一郎,号井井。1879年琉球之争,竹添和李鸿章用汉文笔谈交涉。历任驻清国天津领事、朝鲜常驻公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等官职,著作有《栈云峡雨日记》、《毛诗会笺》、《左氏会笺》、《论语会笺》等。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应该是井上毅。井上号梧阴,原名饭田多久马,出自熊本藩陪臣身份,木下犀潭女婿。精通汉学和法语,1874年日本和清国谈判台湾问题时,日方汉文公牍主要由井上起草。后历任任法制局长官、枢密院书记官长,枢密顾问官、文部大臣等,对明治时代法制和语文政策影响极大,《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起草工作的中心人物之一。井上在木下犀潭的私塾里,除了阅读大量宋学著作,特别关注海防问题以及清朝史。例如万延元年(1860)在《骨董录》里记

① 吴汝纶:《东游丛录》,东京:三省堂书店,1902年,摘抄日记第13页。

② 关于犀潭门下“四天王”,参看武藤1928。竹添有中文略传,见张明杰《关于竹添进一郎及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栈云峡雨日记 苇杭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4页。

录“鸦片之役清所赔出”银两，自编《海防泛录》抄本；文久元年（1861）抄写了魏源《筹海编》。不过，大量阅读了陆陇其等清人的著作以后，井上开始怀疑清朝官修史书都粉饰盛时，最后断言清可以跟秦、隋相比，进一步思考华夷、仁暴的问题，还指责了汉人的懦弱畏怯。井上毅的汉文著作里往往出现黎庶昌、郭云生、黄遵宪的识语、眉批，但在批评清朝政治的几篇中都没有。不知道汉人外交官有没有私下看到这些反满言论？

尝读《东华录》，其所纪满清之治，纲举目张，而圣祖明睿，好文爱民，仁言美事，年不绝书，宜若凌驾汉唐，比隆三代然。及退而验之诸家私载，则知康熙之政未有足称者也。偶读陆氏稼书之书，见其为嘉定、灵寿令，并叙积逋累亿，催纳如火，每事掣肘，民穷不救。^①

古今之变，何有穷极，华夷相克，仁暴相乘。蒙古奇渥温氏杀人千七百万，而能有中国三倍之地！[孟]轲之言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不仁而有天下者，未知有也”。轲也盖不知势者也。^②

余尝怪支那陷于鞑之久，觉罗氏政敝之极，至于今日。而英雄乘时崛起，唱义于天下、恢复旧物者，未闻其人也。……自北人并支那，盖其始刑杀怵众，人人吞恨赍笑，苟全性命，非其本心。及其已久，习以为常，目移意改，名物仪文，奉为时制，育子长孙，甘为其氓，而荡然忘种族之分矣。^③

批评的笔锋还转到秦汉以后的“儒教之弊”，井上特别不喜欢自己曾经浸润过的宋学，认为“秦汉以后，儒者追逐文字，纷汩雕琢，道则末矣。……抑汉唐之弊，犹显而浅，宋学之弊，则微而深”^④。在井上看来，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孝经》、古文《尚书》、《周易》十翼、《仪礼》、《左传》看成“伪托、空言”，其态度也许比姚际恒更为激进。

然至于伦理名教，历代相传，孔丘氏集其大成。其道仁孝忠恕，不索隐怪焉。天地之生久矣，而盛衰乘之。支那之衰也，儒教之弊，训诂词章，雕琢是事，举士人盛年方刚之力，而用之虚文，神气耗竭，徒足愚人。其书若《孝经》、若《书》之古文、若《易》之十翼，伪托极多；《仪礼》繁碎曲拘，非盛世之遗物；彖爻谶纬之类，决非文王、周公之作；《左传》好说神怪，盖成于占卜者之手，传奇

① 《梧阴存稿》卷二《康熙秕政》，东京：六合馆，1895年（近代电子图书馆）。井上在文久元年（1861）以为“康熙、乾隆之政至美”（《井上毅文书 自笔草稿类》缩微胶卷《灯下录》卷二）。

② 《梧阴存稿》卷二《孟轲论》。《元史·太祖纪》：“诤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③ 《梧阴存稿》卷二《陆陇其论》。

④ 《梧阴存稿》卷二《与某丈人论宋学书》。案，该书卷二《驳朱元晦桃庙议》后附黄遵宪（1877—1882年任清国驻日本参赞）识语，井上最迟在1882年以前已经转到了非宋学的立场。

小说之类矣耳。是皆空言无实，而儒家相传为金石鼎彝。……古人说井田，是虽有其言，其实不可行者，而儒者以为治道之本，其泥古无识，大抵此类也。……西洋中古以来，至于今日，器益加巧，数益加精，厚民生，利民用，富强之实，既非三代之比，是为东西盛衰之概焉。^①

不过，井上并没有全面排斥儒教的意思，他虽然强调西洋的“器、数、民生、民用、富强”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三代，在这段引文后面先析论耶稣、犹太、伊斯兰三教的经典，然后积极肯定“余平心以读宇宙之书，其于形而上者，盖以儒教为正大焉”。本文已经谈到，木下犀潭给予西洋的“厚生利用”很高的评价，同时强调了圣人“建极明伦”的意义。“形而上者”选择儒教、形而下者选择西洋，这可以说基本上继承师说，又符合 19 世纪东亚比较常见的思维范式。

二 “华夷变态”、鸦片战争和日本汉学

其实，井上毅反对满清的言论不是他的原创，论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清代初年。崇祯甲申(1644 年)崇祯皇帝自经而亡，接着满人入关，迁明朝神主，爱新觉罗福临即皇帝位，1662 年南明最后灭亡，这一系列事件震撼了整个东亚世界的文化秩序。日本主要通过朱舜水(1659 年赴日)等遗民的谈话以及西吴懒道人《新编剿闯小说》、冯梦龙《中兴伟略》、邹漪《明季遗闻》等汉人所撰小说野史^②了解明清换代，自然产生了“鞑虏横行中原”的反满意识。因此，1661 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占领台湾，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三藩叛清，日本知识界听到消息后一直守望着大海彼岸，期待汉人能复兴中华文明的正统。康熙十三年(1674)朝鲜传说在北京某山发现的玉石上有“红头天子二十年”的纹理，日本有人把它解释为：鞑靼人赤发，鞑靼入关以来已过二十年，不久就会灭亡^③——这轶事完全反映出日本知识界的深层愿望。可是事不如意，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降清，从此以后四方无事。日野龙夫先生曾指出：

关于[18 世纪]日本的国粹主义，可以考虑种种背景。我个人认为很重要，而别人较少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威望的下降。长期以来日本知识界把中国当自己的文化源泉看待。但满洲人征服中国，给了日本知识界极大的打击：你们抬了两千年的孔孟，最后竟然屈服了外族了！在日本 17、18 世纪的思想界，中国失去了原有的权威性。在 18 世纪后期，兰学、国学等非中国、反中国学术

① 《梧阴存稿》卷二《世道论》。此文有光绪十一年(1885)吴大澂识语。

② 林鹅峰：《〈华夷变态〉序》，东京：东洋文库，1958—1959 年。

③ 《华夷变态》上卷，第 95 页。

的崛起,可能是为了填补日本丧失“中国”以后的空白。^①

明代儒学不可谓不盛行,在明清之际,汉人为什么没有抵抗到底,为什么接受了满人的发型、服制?关于这种心态,日野(1996:13—17)曾举出两条例证:第一,平贺源内(1728—1779)的小说《风流志道轩传》(1763年刊)里的风来仙人批评汉人说,文化使他们变得软弱,被鞑靼抢夺天下,四百余州都变成髻粟果式(辮发)的脑袋,竟自命为大清人,窝囊得太不像话。第二,杉田玄白(1733—1817)《狂医之言》(1775年)认为,及至清朝,举国沦为鞑靼。康熙以来一百余年,十三省的人民都穿胡服,受满人约束,而且没听说过有人认为可耻。

不过18世纪以后,东亚的外交关系趋于稳定,日本大量引进清人的著作,同时代的中国学术逐渐传播到日本知识界^②,在儒学领域扩大了影响。土井聿牙(1817—1880)在弘化二年(1845)概述18—19世纪日本学术风气的转变说:“[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6—1728)]二家之学,遂振荡海寓,至不倚其门墙,鲜能自立者,可不谓盛乎!物盛则必衰,方今方今清儒之学渲染人目,而二家津梁,不复有涉者,悲夫!……当二子之盛也,东西士儒争归向之,若暗之待烛,若瞽之赖相,其画像奉祀者,天下皆是。而其死后仅百年,双影乃落于枯纸堆中也。”^③这样相对稳定的情形骤然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是1839—1841年的鸦片战争。清朝惨败英国的消息,使日本朝野震惊,德川幕府不得不修正海防政策,知识界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学术的知识结构已经无力抵抗西洋。嘉永六年(1853)美国佩里舰队来到浦贺要求日本开国并进行水路测量,海防问题成为燃眉之急。生产火药的化学工程、计算敌我距离的测量技术、治疗弹伤火伤的外科医学、西方制度和国际法,汉学家面对这些实学的需要几乎束手无策,只能编纂《孙子》等兵法的新注。日本国内诸侯紧急培养荷兰语翻译^④,洋学派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木下犀潭所撰原田直清(1831—1859)墓志,很能说明当时的学术风气:

弘化、嘉永以来,墨、英等夷更遣使乞互市,边疆戒严,防海之议纷兴。君慨然自奋,且谓清人置夷情于膜外,道光阿片之乱,事皆出于意料外,措置失宜,覆辙可鉴也。于是地理、土俗、兵制、器械等文字及风闻书报,凡涉夷故者,

① 2003年5月27日电子邮件(原文日文,笔者译),日野先生在同年6月15日仙逝。

② 《聿牙遗稿》卷六《翻刻廿二史札记序 代拙堂先生》:“清儒考据之学,至乾隆始衰,丛脞沓复,概无足观者。时之才士,亦稍知其可厌,于是袁子才逃于文,赵云崧逃于诗,皆能性杼而情轴之,别成一家”,“《[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等书,津逮后学,洵称弘益”(土井文次刊本,1892年[近代电子图书馆])。

③ 《聿牙遗稿》卷八《仁斋徂徕双幅遗像记》。

④ 在日本锁国时期(1641—1854)仅有荷兰商船和清国商船可以进入九州长崎港,当地有荷兰通词、唐通事若干名。当时在日本有条件学习的西方语言仅荷兰语。

必极力考索,而恐译洋书者不得其实,从奥山静三学读和兰文字,刻励五六年,颇能通文理。^①

此文后附安井息轩(1799—1876)的识语:“余亦尝有此虑,购和兰文典读之,而年老不能成。读之浩叹。”安井是德川幕府官学昌平黉的教授、程朱学派名儒。一个汉学权威试图掌握荷兰语,等于正式承认了汉学无法抵抗西洋的知识结构。总之,崇禎甲申以后的“华夷变态”、道光鸦片战争先后彻底打垮了日本汉学在知识界的威望。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汉学代表旧制度和旧政体,洋学代表新制度和即将出现的新政体。

三 挣扎中的佛教和汉学

(一)佛教

洋学、国学攻击的目标,不仅是汉学。日本在安政五年(1858)停止锁国政策,跟美、英、法、俄、荷兰五国签订条约开放一些通商口岸,第二年已经有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外国人居留地。这些传教士常有新知识的背景,宣传佛教僧徒的无知和落后,从西洋的立场给日本佛教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明治元年(1868)以后,新政府的宗教政策为国学家、神道家所全面控制,所谓“废佛毁释”让佛教陷入了几年的困境。明治六年(1873),政府正式允许耶稣教在日本传教,此后几年教堂、教徒的发展很快。明治十四年(1881),西本愿寺的赤松连城的讲话里说:“在京都市内的洋教徒认为,如果能有100个信我教的人,压倒20万个佛教僧徒是轻而易举的。……而且不仅是东京、京都、大阪三个大城,到处都有洋教徒。据说东京市内耶稣教徒的人数远比佛教徒多,岂不可叹!”^②这时候对外不平等条约仍然存在,外国传教士只能生活在固定的居留地,耶稣教居然已经蔓延到这样的地步。日本国内有些人士担忧,假如将来政府改正不平等条约,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内地杂居”,外国人获得了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以后,各地的经济、地产由他们来控制,全国的风俗、文化可能迅速走向西化的道路。他们还指出,万一英、德、法等西方语言占去了

① 《桦村遗稿》卷二《原田直清墓表》。“墨”指“墨利坚”,即美国。奥山静三当是奥山静叔(1817—1894),熊本人,1837年赴大阪适塾师从绪方洪庵学习荷兰医学,1846年回熊本后讲授“兰学(即荷兰学术)”(参看武藤1928)。

② 赤松连城:《在制意社的讲话》(笔者译),赤松连城研究会,1984年,第51页。

日本官话的地位,日语、假名、汉字有可能沦落为下层社会的俗语。^①在下文里我们会看到,本愿寺、汉学、国权派往往形成一种忽松忽紧的统一战线,其背景就在于被西方征服的恐怖。

(二) 汉学

洋学、国学认为中国衰落的原因在于汉学的无能。对此,汉学的辩白可以分为几个类型。一种类型截然区分日本汉学和宋明以后的中国学术,把明末汉人的失节或屈服、清朝衰亡的现状都归咎于宋明理学。土井聿牙的弟子、后来成为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名僧的佐佐木狂介(1850—1910)^②在明治十五年至明治二十年间(1882—1887)撰写的《汉学论》是其中一个典型:

今之论者,有嫌于支那文化之颓废不振,遂欲废吾邦所行汉学者。是肤浅之见矣。盖以为汉学与洋学均为他邦之学,而精粗虚实,天渊悬隔,曷若废此兴彼之有裨益于文化!殊不知汉学者吾邦之学,非支那之学也。吾邦之学,矫其弊可也,改其方以适用可也。举而废之,未见其利也。何者,汉学之行千有余年,民之习贯既深,其融入混和于制度、文物、风俗、言语之中者周且密,宛然本邦固有之学矣。矧其书率以邦语读之,既与支那别异,而其所以为道,亦非支那之道。是以千余年间,邦人崇之,未尝取辱于彼。堂堂乎独立东海者,虽云国人之勇悍,未必不藉斯学之资助。由是而言,汉学不独为本邦固有之物,浸化而为国之精神无疑也。在今日宜谋益盛之,以开张文化。惩邻邦之不振,而废我之利器,非策之得者也。^③

在文章后段,佐佐木倡导“汉唐之世,风气淳厚,人尚事功,学亦资实用,好之何害?”接着批评宋明儒学,“其说或偏于性理,或浸于禅悟,共失圣贤之旨,天下滔滔,靡然趋之,人才渐坏,而国灭于夷狄矣”。在这一议论的底层,明显能看到获生徂徕的反

① 国友重章:《条约改正及内地杂居》,东京:内地杂居研究会,1892年(近代电子图书馆)。“内地杂居”从明治三十二年(1899)正式实行。上田万年在明治二十三年发表的《内地杂居以后的语学问题》里仍然表示危机感(上田万年《国语学丛话》,东京:博文馆,1908年)。

② 号抑堂,三重县人,生于净土真宗光莲寺(日本净土真宗从13世纪初以来正式承认僧尼结婚)。兼修汉学、佛学,在新潟学校汉学教师、三重县师范学校、庆应义塾等任教后,一意事佛。著作有马场丈太郎编《抑堂先生遗稿》(东京:乐天堂,1933年)、野口吉三郎编《笃学院佐佐木狂介师遗文集》(小樽:吉田精一印刷,1931年)。传记参看马场丈太郎《抑堂先生行略》(《抑堂先生遗稿》卷首)。

③ 《抑堂先生遗稿》卷一。

宋学立场的影子^①。另外,佐佐木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获生徂徕认为,一旦使用日本式的汉文训读法“诗书礼乐不复为中国之言”,“用字颠倒错杂,不胜其谬”,所以学者应该通晓华音之学。^②佐佐木竟然把它反转过来,强调日本汉学的优越性:“其书率以邦语读之,既与支那别异,而其所以为道,亦非支那之道。”孙歌曾经引述沟口雄三“日本汉学的特征……在于它试图构筑一个没有‘异的’‘自我’的世界”等看法讨论过“日本‘汉学’的临界点”。^③我们也许可以透过佐佐木狂介的话语去观察,被洋学赶进困境、走投无路的“日本汉学在历史上发生性质转变时的动态状况”究竟如何?它为什么“只能是日本学”?

可是,佐佐木《汉学论》(以及前面所述的井上毅《世道论》)的观点会严重侵犯19世纪日本汉学主流程朱学派的权威形象,甚至让人怀疑儒家思想本身的价值^④。另一种类型继承明遗民以来的攘夷观念,把责任推给满人的野蛮。这类型的起源也许在于水户藩——受朱舜水的影响比较深刻——尊皇攘夷论的奠基人藤田幽谷(1774—1826)的言论。藤田读到乾隆皇帝在1759年平定准噶尔的消息,提高了警惕,有如下反应:“素忧戎狄窥边。……满清乾隆之西师,去今二三十年。一水之外,用大兵革如彼,虽海内无虞云乎,而治安焉可恃?乃欲著《西土诘戎记》以警发世之安于无事者。属稿粗成,遭多故不果。”^⑤在攘夷论的影响之下,文政十二年(1829)斋藤南溟(1801—1855)校刊明末《八家集》中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二书,向日本知识界传播了满人的残忍形象。明治二十七年(1894)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向清国军舰开炮然后双方激烈交锋,8月1日两国正式宣战。在日本全国都在激起敌对意识的时候,日本有些汉学家试图把满清描绘成中华礼乐的破坏者,跟自己划清界限。下面以东京日新堂在明治二十七年11月出版的石川鸿斋(1833—1918)《清国五不知论》为例:

初清祖夺燕京也,会明末衰弊之际,僥乘闯贼之乱,略地掠城,得为九州之主焉。从而变先王之遗法,为满夷之风俗,辫发窄袖,毁体去饰,唱侏离之官名,用蜗涎之文字。凡五胡以来,契丹、蒙古之徒,入禹域称帝号者多,然不废

① 佐佐木狂介在明治十二年(1879)第一次读到获生徂徕文集,感觉“旷乎如上昆仑而入玉丛”、“恍乎如尝五味而闻清音”(《抑堂先生遗稿》卷一《与枫井纯书》)。

② 获生徂徕:《学则·一》、《文渊·偏泥国读则有剩复之讹》。

③ 参看孙歌2002所收《日本汉学的临界点》。

④ 佛教僧徒往往无意中侵犯儒家的权威性。明治二十三年(1890),赤松连城应陆军广岛师团的邀请为士兵作演讲说,因为中国有禅让放伐的概念,君臣的“名分不正,结果中国的现状如何?为满洲人所统治,把他奉戴为君主”(《护国指南》[笔者译文],赤松连城研究会1984,第293页)。

⑤ 会泽正志斋:《及门遗范》,大阪浅井吉兵卫刊本〔近代电子图书馆〕。

古,不易俗,礼乐刑政自有存焉者。爱新觉罗氏之为王也,使黔首尽变形,制度百般皆更革之。虽一时以威力服之,历代圣贤之裔犹充实府县。而尽为豚夷之臣,以化塞外万里之俗,亿兆之生灵岂嫌于心乎哉!^①

四 寻找出路

明治十年(1877)紧靠熊本县南境的鹿儿岛县士族发动反政府的西南战争,有不少熊本士族参加了此举。结果叛乱被平定,熊本叛军伤亡惨重,熊本全城遭罹兵燹,市民离散。为了通过熊本藩校时习馆的教育传统复兴熊本,佐佐友房(1854—1906)跟他的同志在明治十二年(1879)成立了同心学舍,十四年(1881)把名称改为同心学校。同心学校有一个在日本中等学校里比较罕见的特色:学科中有汉语、朝鲜语两门第二外语。根据佐佐以及一些人的构想,熊本县应该跟上海通航发展贸易,向大陆寻找自己的前途^②。佐佐友房《济济黄历史》说:“[1881年]2月,跟学校有关人员一起设想国家将来的命运,预期到与中国、朝鲜的关系将是十分密切。因此认为,在正式课程以外,不妨征求一些自愿者学习两国的语言。让十几名学生师从熊本镇台汉语教师榊木某学习汉语……^③”但因经费不足等原因,同心学舍(同心学校)维持三年后被迫停办。

明治十五年(1882),佐佐得到国权主义政党紫溟会成员以及井上毅等熊本出身人士的赞助,成立了新学校济济黄。该校在草创阶段的师资阵容,木下犀潭学系的色彩相当浓厚。往年的“四天王”中,古庄嘉门任副黄长、木村弦雄任皇学汉学教师、井上毅从明治十八年至二十四年(1885—1891)任东京议员。此外,干事津田静一是竹添光鸿的友人,光绪二年(1876)曾同游四川。济济黄在教学方面继承了同心学校的特色,明治十五年至明治二十年(1882—1887)间先后聘请日本陆军熊本镇台汉语教师上林大三郎、御幡雅文(都是熊本人)开设汉语课^④,有不少学生后来在甲午战争期间担任陆军通译官。至于同心学校和济济黄开设汉语课的背景,野

① 封面记载是“明治二十七年10月吉日东京一新堂石印”,但版权页有“明治二十七年11月7日印刷,同月10日登行”的记载(近代电子图书馆)。

② 紫溟会在明治十七年(1884)改称紫溟学会。关于紫溟会(紫溟学会)的国际战略,佐佐1991、佐佐1995有详细介绍。

③ 根据野口1999引文(第136页)翻译,另外参考了高田2002有关记载。本文作者尚未读到《济济黄历史》。

④ 野口1999指出,政府在1894年改正《中学校令》废除中等教育阶段的第二外语,济济黄也向规范化的方向作了努力,因此不得不停止汉语的教学(146页)。另参看《熊本县立中学济济黄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多士》,熊本县立中学济济黄,1912年(近代电子图书馆)。

口 1999 提到了两个可能性:首先是明治十三年(1880)在东京成立的兴亚会附属支那语学校的影响^①;其次是熊本藩校时习馆“华音背书”的学规^②。济济黉毕业生狩野直喜也说:“夙思清、韩与我关系紧密,设两国语科,选生徒学习,且劝游历,以觐形势。至征清役起,各效其用,如先生所料云。”^③

下面简单介绍济济黉的学风浸淫下出来的几个人物,学界之外的井手三郎、中西牛郎,学界之内的古城贞吉、狩野直喜。

(一)学界之外——井手三郎、中西牛郎

井手三郎(1862—1931),熊本人。明治十六年(1883)考入济济黉,十八年(1885)本科毕业以后继续在高等科学学习,选修了汉语。井手在明治二十年(1887)8月下旬航海赴清,游历上海、汉口、安庆、曲阜、北京等地考察国情,在华期间得到了济济黉校友宗方小太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荒尾精(1858—1896)等的帮助^④。明治二十三年(1890)4月离开北京,经过朝鲜回到了日本^⑤。明治二十四年(1891)4月,井手赴京都访问赤松连城,在赤松怂恿之下开始撰写游华考察报告《支那现势论》,同年10月由西本愿寺系统的出版社兴教书院出版。《支那现势论》书前有佐佐友房、中西牛郎、佐佐木狂介和井手本人的汉文序,正文部分加了佐佐木狂介的评点,后附赤松连城的汉文跋。可以看出,此书的出版得到了济济黉(佐佐友房)、西本愿寺(佐佐木狂介、赤松连城)两个系统的一些支持。下面引用自序全文:

东方亚洲,有巨象焉。此象也盘卧长眠,人不知其能起乎否也。是以群兽

-
- ① 参看黑木 2005。《兴亚会假规则》,兴亚会,1880 年(近代电子图书馆)。兴亚会第一任会长冈护美(1842—1906)是原熊本藩主细川齐护第六子,著名外交官员。与黎庶昌、黄遵宪等有酬唱之作,诗集有《云海诗抄》2 卷、《长云海诗草》2 卷(均收在近代电子图书馆)。
- ② 时习馆成立于宝历五年(1755),当时日本全国藩校的学生原则上仅限于武士阶层的男性,教育内容以汉学和武技为主,汉学以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法讲授。时习馆教授秋山玉山属于荻生徂徕学派,要求学生用“华音背书”。《时习馆学规》有如下规定:“读书之法,要眼到、口到、心到,而逐句逐读,语音朗然;平上去入,四声不差;焉哉乎也,一字不漏,务至于背诵不贖,则名为三到矣。……书须背诵,诵须华音,否则四声不明,同训相混,字位或易,语助或脱,不足以供文辞之用,和语之陋也。故书必背诵,诵必华音,而齐、楚合焉。彼此一化,则俟后之君子云耳。”(古城贞吉等编:《肥后文献丛书》第 1 卷,东京:隆文馆,1909 年,第 356—357 页〔近代电子图书馆〕)。野口 1999 指出,时习馆教授后来主要由程朱学派掌权,“华音背书”未能实行(第 136 页)。
- ③ 狩野直喜:《君山文》卷五《佐佐先生胸像记》(1959 年刊本)
- ④ 大里 2005, 2007。
- ⑤ 井手三郎:《支那现势论》,京都:兴教书院,1891 年(近代电子图书馆);野口 1999,第 146—147 页。

之环视者，初不辄近，一旦从西方之两虎，踏绝海万里而至，豺狼伴之，频窥其举动，又屡侵其皮毛，以试象之力量，而象也依然犹眠，其状宛似死者。北方又有一兽，不知其为何兽，唯见眼光射天、利爪锐牙，百兽屏息。其举止之猛烈，决非两虎之所仿佛，是即世所谓兽王者非耶？此兽亦久图南者也。于是乎，象之命脉，其危殆如累卵矣。吁，象也眠乎？果眠焉，群兽将乘其不意。象也病乎？真病焉，群兽将争食其肉。抑是何喻言乎？夫东洋星罗邦国，大割小吞，其在东方而保独立于今日者，才有日、支、韩三国而已！然韩既介于大国间，国力疲弊，西悸北惊，外交之困难，不啻若滕之于齐楚。然则将来我国之所共连轡驰逐，抗彼白人者，独有支那国也。然而窃察支那之现状，内之政纲废弛，因循姑息，瞠若于列国之背后；外之受英佛各国之侮辱不为少，且至彼西比利亚大铁道而告成工，则与鲁之交际，更加艰难也，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又退见我国之现状，亦有不忍言之者。想之思之，岂得不怅然大息哉！庄周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呜呼，庄周岂果谓东洋之豫言者也欤？是为序。明治廿四年辛卯初夏于平安客舍 著者识

“西方之两虎”喻英法两国，“北方一兽”喻俄国（日本所谓“鲁国、露国”）。可以看出，井手回国以后听到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动工的消息，认为清国的觉醒是迫不及待的。佐佐木狂介也在《支那现势论》序里呼吁，假如清国不改革，“不为英所吞，必为露所噬，是其势洵易观，而彼国民未自悟。噫，亦危哉！抑我已与彼为唇齿，一朝无彼，则其所影响殆未可测。茫茫东洋，独立国仅可指数，将来命运果如何，是识者之夙所忧，而未闻有一人能起而为之计者，虽忧何益？”既然目前处于危机状态，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井手强调目前清国有三害（科举、鸦片、妇女裹脚），需要精神上的内部改革。据他的观察，清国有三等人民：官吏、读书人、凡民。其中官吏阶层除了少数人以外严重腐败，平民阶层过于蒙昧，都不能考虑。而读书人“明道理、能做官、有资产、受尊敬”，“上可以动政府，下可以左右人民”，应该积极进行日清两国读书人的合作。为了达到这目的，应该彼此开展文学上的交流，破陋俗之见，“协心驰逐，振作彼我之新元气”。他相信日本、中国分别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和“形势的中心”，促进中国的文明进步是日本的责任，所以在日本国内，应该联合各界关心东方文学、宗教的人士创立“支那事情讲研究所”普及汉语，并派出留学生。在清国，应该（1）跟中方人士合办报社，振兴东方的学术和宗教，使读书人阅读报纸；（2）设置“著书馆”译介有关当代中国的知识，使日本人深入了解邻邦的动态和事实。

这些计划里明显流露着“开化”对待“未开化”的优越感。大里浩秋指出，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由日本来抢救脆弱的中国，而通过两国的合作，形成防御西方